

英语教学的回顾与展望

潘耀琼 盛丽生 王吉玉

学校教育对于建设社会主义高度的精神文明,有着极为重大的作用。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的伟大事业中作出更大的贡献,简略地回顾一下过去的英语教学工作,探讨一下今后发展的前景,确实很有必要。

一 历史回顾

解放前,我国高等院校,除解放区办的学校以外,大致可分两大类:一类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大学,如燕京、圣约翰、金陵、沪江、岭南等共十三所;一类则为国民党政府所办的国立大学,如北京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私人投资开办的大学不包括在内)。在这两类大学中,绝大多数都设有外语系。除少数学校讲授法、德、日等语言外,大部分都是英语。教会大学的英语系师资,大部分为英、美籍教师,其中学有专长的不乏其人,但也有极少数是滥竽充数的。旧国立大学的教师则多为本国的专家学者,也有少数的外籍教师。以武汉大学为例,英语系全系教师仅二十余人,其中教授占百分之八十,多为我国英语界的老前辈,如朱光潜、方重、吴〇、李儒勉先生等,都在学术上有较高的造诣,在教学、科研上做出了成绩。仅就全国通用教材方面来说,就编出好几种,如《近代英文散文选》一、二册,《近代英美散文选》,《大学英文选》,等等。当时的武大英语系,是一个在师资力量和图书设备方面底子比较雄厚,教学、科研和教材建设上都做出了成绩的一个系,在国内高等院校中是名列前茅的。抗日战争时期,武大迁往四川乐山,经常与当时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招生,人们通常称这几所大学为“四联大”。

在旧中国,这两类大学培养出来的英语人才,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教会大学外籍教师多,外语环境优越,实践机会多。录取的学生多半来自教会中学,从小就受到直接教学法的训练,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听、说、读、写实际运用能力强,听、说尤为显著;语音、语调一般比较准确,语言表达方式比较地道。不足之处则是缺乏语言的理性知识,汉语水平不高,笔头翻译能力较为薄弱。国立大学则侧重于阅读与写作,讲解课文多用语法文体分析,英汉对比,文化知识广博。但对听、说训练则重视不够。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就其多数而言,工于阅读和长于书面翻译,有较高的语言文学修养,但口语则一说出来往往是虽然合乎语法,却不合乎外国人的习惯说法。现在看来,这两类学校的英语教学,各有其利弊,各有其优越性和局限性。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总结前辈在这些方面的成败经验,既不生搬硬套,又不全盘否定,而是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一切对我们今天英语教学有益的东西,以改进我们今天的教学,有利于建立符合英语教学的客观规律,又切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英语教学的科学体系。

建国三十二年来,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突飞猛进,外语教育事业有了相

当快的发展。以武汉大学为例：解放前，就只有一个英语系，每学年招生人数约十五名，在校总人数不过六十名左右。建国初期改为外语系，增设了俄语专业；一九七二年以后，又相继添设了日、法、德语专业（一九八〇年起，法语专业扩充为系）。现在，仅英语一个专业，每学年通常招考的新生就有60名。可见，为适应外语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办学规模和语种设置不断相应扩大，招生人数逐步增加。

就英语专业师资队伍来说，也在不断充实和成长壮大，现有教师48人，其中包括教授、副教授8人，讲师19人，助教21人。同解放前相比，由于种种原因，虽然学有专长的老教师有所减弱，语言理论课、文学课的师资严重不足，但中青年教师在不断迅速成长，形成一支以中、老年教师为骨干力量的教师梯队，这是解放以前所没有的。

另外，我们在教学体制、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给英语教学带来很大的变化。教学改革是卓有成效的。解放后，我们一直狠抓基础课教学，注重听、说、读、写基本功的训练，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特别是听、说能力比起解放前来有很大的提高。

正当我们英语教学沿着党指引的方向不断进行改革，向前发展的时候，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浩劫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严重的破坏，停止招生长达五年之久，荒废专业，摧残人才，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我们走了不少弯路，在工作中造成许多失误，有不少沉痛的教训。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一九五三年院系调整，由于片面强调学习俄语，形而上学地把英语看成是“帝国主义的语言”，一度砍掉了公共英语课，并在某些院系中撤销了英语专业。我校英语专业也就是在当时合并出去的，造成英语师资分散，大多数调离学校，少数改行，全校专业英语和公共英语课一度中断，给工作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一九五八年恢复英语专业时，只有四、五位教师，深感人力不足，百废待举，困难重重。我们应该吸取这个教训。今后，在外语语种设置方面，要充分估计外语在国际交往和国际斗争中的需要，以及它在四化建设中的重要性，予以通盘考虑，合理布局，千万不要再形而上学地“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不分青红皂白地乱砍一顿。

其二：不按英语教学的客观规律办事，使英语教学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受到严重的干扰。例如：在教学内容方面，片面强调“突出政治”，把过去选用的教材不加区别地一概加以否定。因此，有一个时期，教材内容尽是一些政治标语、口号和国内出版的英文报刊上的政论性的翻译文章。学生一开始读的多半是imperialism, revisionism, socialism这些多音节的长字，学的多半是中国式的英语，学不到地道的英语。教材中不敢写Mr, please, good morning等西方生活中的常用语，否则就要加上传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罪名，横遭指责。例如，我们高年级选用的斯威夫特的《温和的建议》(A Modest Proposal)这篇课文，虽然有它的局限性，但仍不失为一篇击中十八世纪英国时弊的范文，思想内容和文字都很好，可是，在十年浩劫期间，都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毒害学生思想的典型材料来批判，授课教师也跟着挨了批。

其三：五十年代苏联实用主义的影响，在英语教学中是不小的。一是用狭隘的、实用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基础英语课，把原来是一门综合性的课程分成精读、泛读、听力训练、口语训练等等多种课型。所谓打基本功，也就是把这几个课型的课学好就行了。学生学的知识是窄而又窄，根本不符合周总理对外语学生提出的政治、外语、文化三个基本的要求。二是用

狭隘的、实用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英语专业的文学课,把语言与文学机械地割裂开来。英语学生要学好语言,要不要学点英美文学,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问题,肯定要学。但在十年浩劫中,文学课被打入冷宫,学文学被诬之为“走文学道路”。林彪、“四人帮”虚无主义地对待文学遗产,一提古典文学,就被他们扣上“封、资、修大杂烩”的帽子。殊不知语言与文学的关系,内行一说就知道,英语学生不读文学作品,词汇就无从丰富,艺术鉴赏能力就无从培养,动起笔来就不可能得心应手,英语水平从而也就无法提高。所以,为什么学生英语学到一定程度就难以继续提高呢?就是因为他们在大学四年中所学到的,仅仅是干瘪瘪的几块“豆腐干”似的基础课教材而已。作为一个中国英语专业的大学生,不知道中国的屈原、李白、杜甫等大诗人,更不知道莎士比亚、拜伦、狄更斯等大作家,岂不是贻笑大方?所以,要培养出符合高等教育规格的英语人才,应当把文学课当作一门重要文化知识的专业必修课来对待。要创造条件让学生尽早接触英美文学原著,开阔眼界,培养鉴别与欣赏能力,以填补“十年文荒”所造成的空白点。

象这样的问题还有不少。如何正确处理上述的一些问题,划清是非界限,要靠大家共同努力,肃清“左”的流毒,把林彪、“四人帮”颠倒的历史纠正过来。有些在学术上带有争论性的问题,需要通过讨论、实践逐步去解决。

二 现状与展望

实事求是地分析过去,是为了正确认识现在,和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旧的教育制度无疑是应该批判、抛弃的,但是它的某些局部的具体的教学环节、方法还是有益的,我们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现在试就英语教学的历史和现状作一简单的对比,从中肯定成绩,找出差距,明确今后的努力方向。

一、“四会”方面:

解放前,我校英语专业的教学特点是:“二重”(重文学、重笔头)、“二轻”(轻语言、轻口头)。毕业生笔头功夫比较扎实,知识面广,但有口头不如笔头的弱点。

针对过去英语教学的利弊,我们扬其“文学”、“笔头”之长,避其“语言”、“口头”之短,着重抓学生听、说、读、写的全面训练,收到一定的效果,特别是听、说能力有显著的提高。但也存在以下两个问题:(1)在听、说、读、写全面技能的培养中,对读、写能力的培养抓得不狠、不及时,缺乏有效的措施保证,因此笔头往往落后于口头。一九八〇年,我们曾对英专77级学生进行一次学习质量检查,检查结果表明,该级学生的口语、听译能力都比较强,一般都能用英语较正确、流利地表达思想。但在笔头方面却暴露了一些弱点,文字表达不准确,用词不当,语法拼写有错误等。(2)学生阅读量太少,面太窄,接触原文时间太晚,题材单一。这就导致学生阅读速度慢,理解困难,阅读能力提高不快。

在教学方法上,虽然直接教学法、分析对比教学法、翻译教学法有供我们借鉴参考的地方,但从全局上讲,我们应该探索出适合于我们的教学实际的教学方法。我们曾在64、65和71级低年级阶段试行听说领先教学法,先听说入门,后听说领先,再读写跟上,四会(听、说、读、写)并进。这种教学法确实改变了学生“目治”的习惯,能逐步通过听觉来吸收语言材料,通过口说来模仿和使用地道的英语,收到较好的效果。但这也与句型教学、情景教学一样,只适用于低年级,而且读、写不紧紧跟上的话,就会带来以后学生在书写、拼法上的

粗枝大叶，语法上的错误百出，以及标点符号上的混乱使用等弊病。

二、“三基”方面：

建国以来，我们纠正了旧大学一般存在的重理论知识轻熟练技巧，重文学轻语言，厚古薄今等畸轻畸重的现象，注重从抓基本训练入手，进行教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必须承认，我们的英语教学质量还是不够高的。学生通过四、五年的学习，只是从“四会”基本训练方面初步掌握了英语的熟练技巧，但他们在本门学科的基本知识（语音、语法、词汇、修辞知识，文学知识）和基础理论（语言理论和文学理论）上没有达到相应的要求，理论知识贫乏；文化修养较差，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英语水平。其所以产生上述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我们在教学思想上存在的重实用轻理论、重语言轻文学这种狭隘的、实用主义的倾向很难分开，与我们在处理“三基”的关系上，只顾抓基本训练，不重视抓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的“单打一”的作法很有关系。

三、师资方面：

过去武大英语系师资力量是“一多”“一高”，即教授、学者多；学术水平高。现在英语专业师资力量现状是：“二多”“一低”，即中、青年多，讲师、助教多；学术水平较低。师资力量不能适应当前教育事业日益发展的需要，这种现状必须迅速加以改变。同时必须看到，虽然我系英语专业的“少壮”教师还“少”而不“壮”，但近些年来，由于教学科研实践的锻炼，老年教师的帮助，以及他们自己勇于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使他们都在迅速茁壮成长之中。

以上我们就几个问题简略地检查了现状。昨天已成过去，给我们提供了经验和教训。今天如何改进？明天如何发展？这应该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和解决的重要课题。下面我们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和设想，供大家讨论。

1. 培养目标

纵观全国，外语学院和设有英语专业的高等学校不下几十所。若按各学校性质分类，全国各高等外语院校大体可分为三类：外语学院、综合性大学及师范院校等。这三类学校都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外语人才。各类学校都各有所长，各有所专。我们认为，在为社会主义培养德才兼备的外语人才的总目标下，各类学校应该都有自己的特色，应该根据各自的条件而有所侧重

武汉大学属于综合性大学。它的英语专业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具有社会主义觉悟，较高英语水平，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英语人才。具体说来就是：思想好，学习好，身体好；听、说、读、写全面发展；本门学科的基本技能、基本知识、基础理论扎实；并应以文化知识面广，汉语基础好，文学知识丰富见长。由于综合性大学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它培养的英语毕业生应能担任高等学校的英语教师，外事部门的翻译干部，或科研机构的英国语言、文学的研究人员。

2. 教学体制与教学安排

为了改革英语教学，确保培养目标的实现，现行的教学体制与安排应作适当调整。目前的英语教学体制与安排的实际情况存在三个“不适应”，即：三年基础、一年提高的阶段划分，已不适应学生的客观情况；一些学校现采用的从ABC及音标开步走的大学英语教材，已不能适应学生入校的英语实际水平；以精读、泛读、口笔语实践为主课的“四年一贯制”，已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鉴于目前新生入校的英语水平逐年提高，对新生的补课、巩固阶段

要相应缩短。就英语基础课的教学而言,语音、语法、词汇的基本训练和基本知识的传授与巩固,必须在一、二年级完成,争取在低年级阶段,语音基本过关。我们认为,基础阶段与提高阶段的划分应是:两年基础、三年提高,学制改为五年制。基础阶段不宜拖得太长。

另外,教材必须更新。“豆腐干”式的精读课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多少年来,这种“豆腐干”式的精读,贯穿在从低年级到高年级的整个大学学习阶段,目前已经是非改不可了。

关于两个阶段的教学法,我们认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多种形式的教学法。基础阶段可采取听说领先为主,进行句型教学、情景教学、功能教学等。提高阶段则不妨适当地采用翻译、英汉对比等等教学法。这仅仅是笼统的提法。更切合实际的做法还得根据学生入学的水平,选用的教材,师资的配备等方面的情况。总之,选择一种最合适的教学方法,再博采其它方法之所长,以弥补其所短。

3. 课程设置

针对综合大学英语专业培养目标的特点,我们打算在最近期间开设实践提高课“英美散文选”,以取代高年级的基础英语课。同时开出“英美文学史”课(高年级必修),以讲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学史知识为主,在教学中结合一定的作品分析。并创造条件逐步开设高年级选修课“英美小说选读”、“英美诗歌选读”、“英美戏剧选读”、“加、澳、新文学”等等。由于专业教学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还需要较多时间进行口、笔头基本训练,专业理论课不宜开设过早。现已开出“英语语法学”,再继续开出“英语语音学”、“英语词汇学”、“英语修辞学”,“文体学”等。这类课程以选修或专题讲座方式开设。

谈到基本功,人们的理解并不一致,有的人认为是指英语的听、说、读、写的基本训练和基础知识。这种理解并不错,但是不全面。我们认为,对基本功的理解应该是广义的。作为一个英语工作者,他的基本功应该是,除了英语基本功之外,还应包括汉语、文学、历史、地理、哲学以及所学语言国家概况在内的文化基本知识。只有根据这种理解安排教学,才能培养出适应工作需要的合格的英语人才。为此,我们打算在近年内开设或请兄弟系为我们开设“汉语与写作”(一年级)、“古代汉语”(二年级)、“中国通史”、“英国史”、“美国史”、“欧洲文学史”等课程,作为专业必修课。

4. 切实加强低年级教学,把好基础关

低年级教学在整个英语教学中是关键阶段。它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基本功和基础知识掌握的好与坏,也体现了我们教学的成与败。因此,我们对低年级英语教学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启蒙、指路之师又是低年级教学的关键,我们拟以三个方面加强工作:一是在原有教师的基础上,再配备一些有经验的中、老年教师,集体把好语音、语法、词汇三个关。二是采取必要措施,切实贯彻精讲、多练的原则,讲要透,练要够,集中火力,猛攻语言,使四会能力基本过关。三是组织教师定期研究分析教学问题,互相观摩,评教评学,以提高教学水平。

5. 师资培养、补充

我们目前的师资队伍,比起五八年恢复英语专业时虽然有较大发展,但还远远不能适应需要。我们现有的教师多数是六十、七十年代毕业的。关于师资培养,我们采取派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在职进修与脱产进修相结合等方式,积极培养中、青年教师。我们已前后派出

六名教师去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进修、学习，还有两名教师即将赴美深造。凡派出去的教师都要进行有针对性的进修，既根据他们各自的专长和爱好，又结合系里需要开出的课程到国外进修。这样，就要求他们回来后除担任基础课教学外，还必须能开出一门选修课。我们还努力争取各种机会派教师到各兄弟院校学习，或者留校参加由外籍教师授课的教师进修班，旁听研究生课等等。

另外，我们还从本校培养的研究生中选留一部分教师。从今年起，我们开始招收硕士学位研究生，今后还将不断扩大研究生招收名额，为补充教师力量提供了重要的来源。

师资的培养和补充，主要靠自力更生，但与此同时还争取外援。今年我们聘请了六名外籍英语教师、专家参加工作，这对我们的教学无疑是有较大的促进。但如何合理使用外籍教师、专家，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这是应当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我们是这样做的：

(1) 妥善安排工作，根据外籍教师、专家的专业特点，安排他们担任听说课、概况课、作文课或低年级精读课。各门课程的目的、要求和作法，都必须事先给他们交代清楚，让他们心中有数。

(2) 组织文化知识讲座或语言、文学专题讲座，充分发挥外籍教师、专家的特长。这种面向专业师生的讲座通常每周举办一次，由他们轮流主讲。讲的内容丰富多彩(如美国法律，美国体育运动，美国方言，圣经故事，莎剧“威尼斯商人”的语言以及其它专题等)，形式生动活泼，很受师生欢迎。

(3) 中国教师、外籍教师互相配合，一起备课，彼此取长补短，共同探讨问题。由于外籍教师对学生的情况不甚了解，并缺少教中国学生的教学经验，有中国教师参加备课或帮助备课，可以弥补外籍教师的不足。

另外，我们还专门派青年教师担任辅导，协助外籍教师进行教学工作，在课外辅导学生，帮助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发现教学中的各种问题，并解决部分练习中的中英对译问题等等。同时，青年教师也可借此机会锻炼听、说，提高口语能力。原来有一位外籍教师，对派中国教师当辅导很反感，过了一段时间，教学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当工作需要调走这位青年教师时，这位外籍教师坚决反对，并提出抗议，经过说服，另调一位青年教师协助他工作，他才同意了。这样做，我们满意，学生满意，外籍教师也满意。

回顾建国三十二年来的英语教学工作，我们确实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遇到很多挫折，走了不少弯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应发扬成绩，吸取教训。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全面地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文化教育恢复了生机，呈现了初步繁荣兴旺的景象。一九七八年夏，教育部召开了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后，又召开了全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以及即将召开的全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等，外语教学进入了发展的新时期，形势十分喜人。我们近年来的工作，虽然有了一些进展，但与兄弟院校相比，与四化建设的蓬勃发展相比，与世界科学技术的飞跃向前相比，差距还很大很大，我们要加速前进的步伐，为国家培养出合格的英语人才而努力。